

校友回忆录

XIAO YOU HUI YI LU

1

西北工业大学校友会 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西北工业大学七十周年校庆文集

校 友 回 忆 录

(1)

西北工业大学校友会 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友回忆录/西北工业大学校友会编.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612 - 2472 - 4

I. 校… II. 西… III. 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G649.2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934 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邮编:710072

电 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 址:www.nwpup.com

印 刷 者: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960 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69 千字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校友回忆录》编委会

总策划：王伟

主 编：吴丁毅

副主编：张英群 付高明

编 辑：可方玲 彭雪梅

刘 婧 魏泽懋

目 录

如歌的岁月（代序）	（2001年到校）	姜澄宇/1
回忆在西北工学院时的几件事	（1941级）	师昌绪/3
记西工大地震测报科研组的一段经历	（1951级）	任文选/8
华东航空学院学习生活片段回忆	（1952级）	朱凤驭/12
我校成功研制三坐标数控铣床的经过及其影响		

.....	（1952年到校）	陈德元/27
忆金色年华	（1952级）	陈秋铭/32
直升机专业创建初期的二三事	（1952级）	郭士龙/35
回忆华东航空学院的学生广播站	（1952级）	陆新蠡/38
留校任七系专业助教的感受	（1952级）	叶惠民/41
华航西迁与直升机专业的创建	（1952级）	郭泽弘/44
西工大在记忆中成长	（1953年到校）	曹守裕/48
我的二三事	（1953年到校）	杨庆雄/53
回忆在哈军工的日子	（1953级）	陆彦/58
回忆我的大学生活	（1953级）	何大为/61
母校光辉 泽被学子	（1953级）	甘宇平/65
小学生对西北工学院的回忆	（1953级）	孙澄/68
杏坛拾贝	（1953年到校）	楼世正/73
西工大四年的回忆	（1954级）	何报德/83
怀念西工大 怀念寿松涛校长	（1955级）	寿尚德/89

忆母校小故事	(1955 级) 何慧婉	92
母亲生活回忆片段	(1955 级) 朱继伟	99
难忘的大学生活	(1955 级) 张鲁民	107
忆五六十年代的教材建设	(1955 级) 恽君壁	109
难忘的关怀	(1955 级) 吴化连	113
从一张照片到大型数控布带缠绕机的研制过程		
	(1955 级) 严新民	116
趣忆舌战群“儒”	(1955 级) 陈国瑞	121
回忆我所接受的基础和专业教育	(1956 级) 马远良	125
我们的事业从哈军工起步	(1956 级) 宁显宗	130
我与西工大同龄	(1956 级) 宋士贤	133
忆鱼雷定型会议	(1956 级) 王三刚	142
难忘的几件事	(1964 级) 周智敏	144
西工大在发展	(1973 年到校) 辛 柯	148
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1974 级) 杨广林	153
高音喇叭呼唤的人生巨变	(1977 级) 杨海成	156
我记忆中的高考那些事	(1977 级) 葛 森	158
我的 80 年代	(1978 级) 李 都	168
我为你自豪——西工大	(1978 级) 金志明	181
迟到的总结	(1978 级) 李安平	183
半个世纪的春华秋实	(1980 级) 齐 蓉	185
摄影队的“产品”	(1980 级) 张保安	197
难忘的青春岁月	(1982 级) 王建刚	202
西工大忆事：杀鸡、表姐及其他	(1984 级) 李秀丽	205
追忆心底的记忆	(1985 级) 高坚新	211
唯我独尊	(1985 级) 陈恒光	215
往事的回忆	(1985 级) 成 刚	220
23 舍 332 室	(1986 级) 田凤欣	225

岁月如歌	(1988 级) 凌汉宏 / 227
回忆	(1991 级) 王 黜 / 229
忆西平	(1991 级) 冯培刚 / 237
西工大, 我难以割舍的家	(1994 级) 寇晓东 / 240
有你, 我相随 (University)	(1996 级) 李红阳 / 244
似水流年	(1998 级) 赵媛媛 / 247
暖春	(2001 级) 刘佳佳 / 251
追忆似水年华	(2003 级) 李明杰 / 254
西工大的课堂以外	(2005 级) 冷 哲 / 257
遇见李航航	(2006 级) 周运来 / 260
校友老照片	/ 262
再征稿 (代后记)	(1977 级) 吴丁毅 / 278

如歌的岁月(代序)

——在纪念 77 级入学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姜澄宇^①

1

77、78 级的群体是从火红的年代走过来的。

恢复高考之前，我已在南京汽车制造总装厂工作。当时的想法非常朴实，就是要好好当个工人，根本没有料到还有机会去大学深造。得到可以考大学的消息时，包括周围很多人在内都不相信这是个事实。这样，我就成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幸运者。

四年的大学生活，同学们都很珍惜。学校的老师也称赞从没见过像我们这么刻苦用功的。的确，“文革”耽搁了这么多年，大家怀着报效国家的激情，迫切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蹉跎岁月补回来，所以学习格外认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这一届在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一届。我们为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许多人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毕业后的这 30 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30 年，我们见证了这一历史，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值得高兴。

今年 10 月，适逢西北工业大学 70 周年校庆。校友会精心编辑出

① 姜澄宇：1977 级，2001 年到校，现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西北工业大学校友会会长。

版了这本回忆录以为献礼。我也谨以此文缅怀这段如歌的岁月并为代序。希望校友们永远记住在大学的岁月，好好地珍惜未来，为国家，也为家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忆在西北工学院时的几件事

师昌绪^①

我是1945年夏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冶金组的，获学士学位。

1941年春在国立第一中学一分校毕业后，我经历千辛万苦从河南省西部的西峡口辗转来到陕西省南部的城固县。那时大学都是夏季招生，秋季入学。我们在春季中学毕业以后，可以找些工作，也可以入大学先修班，于是我便进入了设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大学先修班”。西北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先修班的老师来自原师大附中，水平很高，要求也很严，结业时我考了个第二名，被保送到西南联大，由于缺少路费，没能成行。于是我就近报考了国立西北工学院。

国立西北工学院原是西北联大的一部分。西北联大由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组成，先是称为西安临时大学，后来移到陕南，1938年7月又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



^① 师昌绪：1941级，西北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冶金组，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及国立西北医院。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后来从河南焦作搬来的私立焦作工学院组成。当时西北工学院设有 8 个系，即土木、矿冶、机械、电机、纺织、化工、水利及航空，师生共千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工科大学。那时我报考矿冶系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那时实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开矿炼钢当属首位；二是西北工学院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虽然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但私立焦作工学院原在英商福中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到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因而我报考了矿冶系。发榜以后，9 月入学，一读就是 4 年，现仅将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写来供大家分享。

1. 大学一年级潜心读书，躲过很高的淘汰率

从 1941 年开始，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开始在距离校本部 40 里以外的七星寺上课，这是一个环境优美、全新校舍、远离闹区的一片净土。我们一年级被分为甲乙丙班，我在丙班。在这一百多个学生中，只有几个女生，没日没夜连星期天都在上课做习题。虽然生活很苦，倒也苦中有乐，因为没有使人担心的琐事，一心只知读书，不问窗外事，只有那些中日战争形势经常失利时使人烦心，但也无能为力。

我们专注读书的情况，可用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和我在当时的交往为例。我和高景德虽是同班同宿舍，可是我们却很少在宿舍见面，因为他经常在半夜才从教室归来，而我在那时正在酣睡。我则两三点钟起床，一直在教室工作到吃早饭。因此，尽管我们同吃、同住、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可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到了二年级，他选的是电机系电力组，我选的是矿冶系冶金组，仅在有些共同课程一起上课时（如机构学、材料力学、应用力学等）才有更多的接触机会。由于我们两人学习上在所在班系名列前茅，1945 年毕业的那年，我俩是全校五个“林森奖学金”获得者之中的（林森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解放后他留学苏联，是我国第一位苏联博士，20 世纪 80 年代他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我是 1948 年出国的，1980 年我们同批被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4 年我被聘为这个学部的学部主任，不

久，高景德被选为副主任，彼此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当时，西北工学院一年级的课程很多，教课教授主要是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老教授，如教物理的黄苍林教授、教英文的张朵山教授等。他们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在考试前从不限范围，甚至是突然袭击，完全出于平等竞争。所以学生虽然日以继夜地在攻读，考试完毕后，总有几名不及格的。一年级结业时有三分之一左右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被勒令退学。

2. 在古路坝期间艰苦奋斗，苦中求乐

在抗战期间，大学所在地有三个坝（在中国西部将山中小平原称之为坝），那就是四川省成都附近的华西坝，是华西大学所在地；沙坪坝，是重庆中央大学及重庆大学所在地；陕西南部秦岭及巴山山脉之间的古路坝，就是西北工学院所在地。人们称这三个坝为“天上、人间、地狱”。因为这三个地方生活条件相差十分悬殊。古路坝是一个大天主教堂之所在地，据说那里的土地都属于教堂的领地，附近多属贫苦教民，以务农为生，是落后的贫苦地区。古路坝北距县城（城固县）40里，向西70里可到陕南最大城市汉中，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滑竿供老弱及富人享用。这样的地方，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却像旅游胜地：空气清馨、竹林遍野，有时还有潺潺的小溪流过，宏伟的大教堂屹立山头，早晚还有清脆的钟声，然而这些对长年居住在那里的青年学子们来说，却没有那种感觉。吃的是红稻米稠粥，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干打垒宿舍，除了读书学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只在七八里以外有一个小镇，叫盐井坝，偶尔有一场汉剧（有点像京剧）。不少同学与农民混在一起，站在台下挤来挤去，等看完戏回到古路坝时，已是深夜。古路坝有一个像样的饭馆，叫“中华食堂”，那里经常客满，是供那些有经济来源的人享用，像我这样只靠贷金维持生活的贫苦学生，自然不敢问津。生活枯燥的另一个原因是青年学生的男女比例失调，像在古路坝的几百名学生中，女生不过十几人，而且主要分布在化工与纺织两系。所幸那时的大学生都是流亡学生，无家可归，朝夕相处，感情至深；每逢饭后，三三两两围着古路坝山头绕来绕去，倒也悠闲自在。到了节假日，打球的打球，玩牌的

玩牌，更多的是在教室学习和开展学术活动。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既不打球，也很少玩牌，于是我们几个人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金风读书会”，主要从事学术活动，丝毫没有政治背景，可是到了“文革”，却成了说不清的“反动组织”。

3. 青年从军的一幕

1943 年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距重庆只有几百公里，国民政府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号召大学生参军，西北工学院自不例外。在秋天的一个早晨，全院师生齐集升旗院，按班级列队，潘承孝院长主持会议，讲了国难当头的紧急情况，动员全体师生投笔从戎。首先由他签名，继而教务长、训导长及全体教授、讲师和助教。同时并宣称爱国青年请靠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有谁甘心做不爱国的青年呢，因而除极少数青年从旁门溜到后山以外，全体师生依次登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当然也不例外。名单报到重庆教育部后，只批准了 40 多人，其中不包括发起动员学生从军的国民党党部总干事，于是惹怒了广大群众，大声叫骂，当时院内热闹非凡，特别是在召开欢送大会时，对致欢送词的人选存在很大争议，最后推举我出面，才算平息了下来，因为我是双方都接受的人。后来这位总干事在群众压力下，也参加了青年军。据说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多数被派往缅甸，成为中美联军的翻译；他们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也增长了阅历，又锻炼了英语会话能力。

4. 系主任带头拒绝参加“谢师宴”

抗战时期的西北工学院，所有学生虽然都靠国家贷金维持生活，但是到了毕业那年，每个班级都要举办一次“谢师宴”，宴请本系教师以表达感恩之情。但是在我们毕业的那年我却惹了大祸，由于我在系会上做了有害本系教师尊严的发言，系主任带头拒绝参加我们举办的谢师宴，成为我这一生最为尴尬的一桩事。

其缘由如下：自升至二年级到古路坝以后，我一直是班代表，主要是因为我热心公益事务，肯为同学服务而很少偏见。到了三年级又被选为矿冶系系会主席。当时我深感矿冶系的某些教授老气横秋，他们虽然都曾在美国有名的矿业学院留过学，如科罗拉多矿院

(Colocado School of Mines) 及来苏里矿院 (Miescuin School of Mines)，但他们编的讲义多年不换，靠老本应付差事，我深感误人子弟，所以我根本不听他们的课，他们在台上讲，我从图书馆借一本与之相关的英文原版在台下看，因他们的讲课不屑一听。从系风来看，比起机械系和电机系等也显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为此，在一次全系大会上，我提出了批评，这就惹恼了几位年迈的老教授，到了请他们参加我们召开的谢师宴时，他们拒绝参加，并说：“我们不配当你们的老师”。当时同学们的反应不一，有的对我备加指责，认为我不该出此伤害老师自尊的言语；也有不少同情我的发言，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刺激，但是做为当事人的我，却感到内疚。众人商量的结果是向几位开明有影响的教授求援。一位是担任国家技正职务的李善棠教授，为了参加谢师宴，他正从汉中来古路坝途中；另一位是知名地质学家张伯声教授（解放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两位教授都答应出面斡旋，最终以我向他们道歉了事，按时在“中华食堂”完成了这次谢师宴，从中我也受到了教育。

总之，在西北工学院的四年里，在治学上我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并获得全班第一名的高分。通过认真诚意为大家服务，我也学会了如何做人，那就是与人为善，海纳百川。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的话，和在西北工学院四年酸甜苦辣的生活不无关系。

记西工大地震测报科研组的一段经历

任文选^① 陈德元

8

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我国的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地震。不到3分钟就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受伤70万人。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到7.8级。其后，四川松潘地区又发生一次7.6级大地震，西安也有震感，床和桌子都摇动了，这使西安人对地震有了感性认识。

这一年陕西关中地震带也特别活跃。各群测群防点经常收集到一些前兆信息，如：土地电信号异常、火球下地、井水混浊变味、蛇出洞、老鼠不怕人结队乱跑等等。不久，国家地震局的一位副局长在西安市的一次震情分析会上宣布西安处于临震前兆状态。这一下，大家慌了手脚，家家搭防震棚，一个冬天都在院子里的防震棚中度过。好在那时房子没有现在这么挤，各单位都有不少空院落可供大家搭防震棚。

我校按上级要求成立了抗震防震办公室，下设有地震测报组。我校是碑林区西片震情测报科研组的组长单位。组长是我校任文选同志。

^① 任文选：1951级，西北工学院石油系，石油及天然气工学专业，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系教授，现退休。

我校党政领导对地震测报工作非常重视，由党委副书记李望怀同志和校长助理周奎同志直接领导。除下拨专项经费外，还将校地震测报组扩建为地震测报科研组，由任文选任组长，主管测报，陈德元任副组长，主管科研。其目的是要把军工技术用于地震测报以提高我校的地震测报水平。

对西工大的教工来说，抗地震测报，都是外行。于是我们先后多次派出测报人员参加市、区及学校组织的外出考察学习，包括去云南和晋西南、西安子午台地震台及天津市宝坻地震台。学习地震测报的各种手段及预报方法，从而使大家在业务上提高了一大步。好在校内各群测群防点的成员都很努力，很快就入了门。当时的手段虽然比较一般，如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但他们不辞辛苦，日夜在测报点上值班，不放过一个可疑数据，认真记录，并定期参加震情会商。不仅稳定了我校的人心，也为我校地震测报科研组树立在西安市的地位打下了基础。从而产生了一批辛勤工作的积极分子，他们是李怀生、付正阳、高治平、陈铁民、薛学涛、任文选、陈德元、寇发祥、戈淑瑞、沈允文、申宗祺、张声万、王啟文、相俊杰、谢会崇、沈士华、姜存发、汤文及、宋士贤、张淑琴、王大选、郭毓秀、蔡绪忠、袁国俊、张开达、段红、王忠盛、李武功、宋珍芝等。

地震测报科研组在原新建球场西边，盖了两间抗震房作为办公室及仪器间。通过一段实践，大家感到要利用西工大拥有军工技术的优越条件，应该在不影响保密的原则下把它用于地震测报。我们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研制出三种地震测报前兆仪器，即：水声测震仪、磁引信息、地应力仪。

地震的发生源于地壳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大断裂，根据断裂机理，在大的断裂之前一定会出现一连串小的断裂。这就是“小震闹、大震到”的理论。地壳在断裂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细微的声、磁和地应力的变化。我们利用学校有关实验室中旧的传感元件，制作了三台仪器，参加到实战中去考验，首先是在陕西地区参加地震测报工作。

1976年元旦前夕，西安的地震形势非常紧张，各种前兆不断出现，当时在小寨饭店召开了一次保密级别较高的震情分析会，我校派

李怀生、任文选、陈德元三人参加。在绝大多数单位都认为元旦过不去，大震即将来临时，陈德元同志代表西工大发表了相反的意见，认为根据我们的手段反映，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可以安度元旦。事实证明我们说对了，西工大地震测报科研组一下子出了名，连省地震局也派人来察看我们的“秘密武器”。

当时我校地震测报科研组的事业是很兴旺的，就连老党委书记刘海滨同志每到晚上也常拄着两根拐杖到测报科研组办公室来问：“今天晚上情况如何？”因为他知道不少地震都在夜间发生。我们告诉他，今晚平安无事，他就放心地回去了。

地震测报不同于搞一般性的科学的研究，如果你要向上级地震主管部门预报震情，首先要阐述理由，其次要报出震情三要素，即时间、地点（方位十距离）和震级。如果错报或漏报都属于工作中的失误。

我校地震测报科研组最成功的一次案例，是靠近我省千阳县的甘肃省陇县发生一次 4.3 级地震，这次地震只有西工大一家作了预报，专业部门也漏报了，为此，我校受到省委副书记章泽同志的口头表扬，陕西日报曾用二分之一的版面详细报道了西工大地震测报科研组的先进事迹。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固步自封，于是组织提出，乘现在唐山地区不断有四五级余震，我们应该带着我们自己研制的三种测报手段到唐山去实地考验。这一设想得到全组同志的拥护和校领导的支持。经过省市地震部门的推荐和国家地震局的批准，我们曾两次去天津市地震局直属的宝坻地震台，去实地考验我们的三种前兆仪器，历时近三个月。我们曾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对唐山周围发生的五次五级以上余震作了比较准确的预报，受到国家地震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重视。中科院院士傅承义先生（地球所）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并亲自来现场考察，后因病作罢。我们的工作，还得到张伯声院士的赞扬，认为可同国外水平相比拟。

1978 年我校研制成功的三种前兆测报仪器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地震测报前兆仪器展会。

1980 年国家地震局下拨科研经费 12 万元，要求我们研制“地声